

现在的屠杀者〔1〕

高雅的人〔2〕说，“白话鄙俚浅陋〔3〕，不值识者〔4〕一哂〔5〕之者也。”

中国不识字的人，单会讲话，“鄙俚浅陋”，不必说了。“因为自己不通，所以提倡白话，以自文其陋”如我辈的人，正是“鄙俚浅陋”，也不在话下了。最可叹的是几位雅人，也还不能如《镜花缘》里说的君子国的酒保〔6〕一般，满口“酒要一壶乎，两壶乎，菜要一碟乎，两碟乎”的终日高雅，却只能在呻吟古文〔7〕时，显出高古品格；一到讲话，便依然是“鄙俚浅陋”的白话了。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竟至总共“不值一哂”，真是可怜煞人〔8〕。

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9〕朽腐的名教〔10〕，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

《热风·随感录五十七》

注 释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五日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第六卷第五号，署名唐俟。后由作者编入《热风》。

〔2〕高雅的人：高深古雅的人。这是对自命为高古的封建复古主义者的讽刺。

〔3〕鄙俚浅陋，粗俗浅薄。

〔4〕识者：所谓有见识有学问的人。

〔5〕哂（shěn）：带有轻蔑意味的微笑。

〔6〕《镜花缘》里说的君子国的酒保：《镜花缘》，清朝李汝珍所著一百回的长篇小说。“君子国”，应为“淑士国”。这里所引酒保（旧社会酒店侍者）的话，见《镜花缘》第二十三回《说酸话酒保咬文》。

〔7〕呻吟古文：讽刺封建复古主义者读文言文时的声音象患病的人哼哼呀呀一样。

〔8〕可怜煞人：可怜到了极点。

〔9〕勒派：宣扬、鼓吹、强迫遵行之意。

〔10〕名教：即封建礼教。因儒家主张“正名”，即用名分（身份、地位）来束缚人们的言行，所以叫名教。这里指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典章制度、道德教条。

讲 解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论人民民主专政》）。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一九一九年爆发了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使中国革命进入了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政治革命运动，同时也是一次伟大而深刻的文化革命运动。“五四”文化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打倒孔家店”，彻底批判几千年来为封建宗法制度服务的孔孟之道，批判以孔孟之道为基础的旧道德以及宣传旧道德的旧文学，使广大人民群众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因此，“五四”文化新军在从一开始，便“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新民主主义论》），摆开阵势，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旧文化展开了英勇的、猛烈的进攻。

新思想的广泛传播和新文学运动的蓬勃开展，严重地动摇了封建制度的政治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因而引起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极

大恐惧与疯狂反扑。在“五四”前后，形形色色的封建复古主义者为了维护封建文化和封建制度，积极提倡尊孔复古，鼓吹中国的所谓“固有文明”，并以保存“国粹”为名，竭力张皇旧学反对新学、维护文言文反对白话文，疯狂地攻击文学革命和一切改革。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旗手，是当时“打倒孔家店”的一员“主将”。他为了打击封建复古主义者的嚣张气焰，为新文化运动的广泛深入开展扫清道路，写了许多匕首投枪般的杂文，对复古派的种种谬论进行了尖锐而深刻的批判，使他们一个个原形毕露。《随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便是“对于所谓‘国粹派’而发的”。

一切抱残守缺反对革命的顽固派，都是“现在的屠杀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粹派为了反对表现新思想、宣传新思想的新文学和保存表现旧思想、宣扬孔孟之道的旧文学，对当时适应无产阶级革命要求而兴起的白话文运动，极尽诬蔑和攻击之能事。一九一九年春，刘师培等人创刊《国故》，鼓吹保存“国粹”，疯狂攻击新文化运动。与此同时，林纾在《新申报》上先后抛出《荆生》和《妖梦》两篇攻击新文化运动的小说，漫骂宣传新思想的白话文是乱人“清听”的“禽兽之语”，还希望封建军阀徐树铮等人象《荆生》里的“伟丈夫”和《妖梦》中的罗睺罗鬼王那样，公开出面扼杀新文学运动和惩治提倡白话文的人。他在《致蔡鹤卿太史书》中，竭力诋毁宣传新思想的白话文，并为宣扬封建思想的文言文进行辩护，胡说什么“若尽废古书，行用方言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据此则凡京津之裨贩，均可用为教授矣”。胡先骕在《中国文学改良论（上）》中，竟认为以人民大众语言为基础的白话文，是“驳杂不纯”的东西，不能入文艺之林，并诬蔑写白话文者是“以浅陋以文其浅陋”等等。

鲁迅为了批驳国粹派的无耻谰言，支持白话文这一新生事物，在《现在的屠杀者》这篇短评的一开头，就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自命为高深古雅的国粹派，讽刺他们是“高雅的人”。同时，开门见

山地提出他们的反动荒谬观点，紧紧抓住他们反对白话文这一点，树立起批驳的靶子。随后，针锋相对地用了“不必说了”和“不在话下了”两个反语，对国粹派进行了辛辣的嘲讽，非常巧妙地对他们所叫嚷的两个“鄙俚浅陋”进行了有力的回击。紧接着，鲁迅便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对国粹派的叫嚷进行揭露和驳斥。鲁迅气愤而幽默地指出：“最可叹的”是认为白话鄙陋可晒的“几位雅人”，也还不能如《镜花缘》里所说的“君子国（按：应为淑士国）的酒保一般”的“终日高雅，却只能在呻吟古文时，显出高古品格；一到讲话，便依然是‘鄙俚浅陋’的白话了”。这就非常具体而生动地揭示出了国粹派维护文言文、反对白话文的行径，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是行不通的；不仅一般人不能终日“高古”、“文雅”，满口“之乎者也”，就是国粹派这样的所谓“雅人”、“识者”，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不能付诸实行的。从而深刻地说明了国粹派提出这个言行背谬的主张，是别有用心。随后，鲁迅为了进一步揭露这些封建卫道士敌视人民和蔑视人民大众语言的罪行，又愤怒地指出：“雅人”们对于“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竟视为“‘不值一晒’，真是可怜煞人”。通过正反两个方面的揭露和驳斥，国粹派的反动本质和丑恶嘴脸，便暴露无遗了。

那么，国粹派为什么要死死抱住文言文这具僵尸不放呢？鲁迅在文章的最后明确指出：这些封建遗老“明明是现代人”，“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都是”为了屠杀“现在”；因为，屠杀了“现在”，也便屠杀了“将来”——“子孙的时代”。从这里，我们便可看出：艰深晦涩的文言文并不是什么“国粹”，而是封建文化的表现形式和宣传工具；国粹派也并不真正懂得什么是“国粹”，而是一些假古董，是一伙反动派；他们之所以竭力维护文言文反对白话文，其罪恶目的，在于利用文言文来奴役人民，束缚人民的思想，阻止革命理论的传播和文化教育的普及，进而在政治上反对社会改革，阻挡革命的历史潮流。由此，也可以清楚地看到：

鲁迅与林纾等人展开的这场所谓白话与文言之争，实质上是新学与旧学、新思想与旧思想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在文学领域里的反映。这场斗争决不仅仅是文学形式的论争，而是关系到文学究竟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革命政治服务，还是为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治服务的大问题。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历史的发展就是新事物代替旧事物。“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没有对旧事物的“亵渎”，就不会有新事物的成长。新事物成长的过程，就是同反动腐朽势力斗争的过程。革命的新生事物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彻底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而获得发展壮大。在我们中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领导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没有鲁迅这样敢于彻底“打倒孔家店”，与“现在的屠杀者”进行坚决斗争的猛将，也就不会有中国人民的“现在”和“将来”。

短评是一种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锐利武器。鲁迅也最爱使用这种短小精悍，仅以一击而致敌于死命的武器来攻击敌人。他认为“好作长文而不善于短文”是一大缺陷。鲁迅曾在致许广平的信中指出：写那种“历举对手之语，从头至尾，逐一驳去”的长文章，“虽然犀利，但不沉重，且罕有正对‘论敌’之要害，仅以一击给与致命的重伤者”。《现在的屠杀者》这篇短评，旗帜鲜明，尖锐泼辣，始终紧紧抓住“论敌”的要害，猛攻敌人的漏洞和致命弱点，揭示问题的本质。全文仅二百余字，便勾画出了林纾、胡先骕等一伙封建卫道士的丑恶嘴脸，揭露出他们的反动本质，使他们的“麒麟皮下露出马脚”来。这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灯下漫笔⁽¹⁾

一

有一时，就是民国二三年时候，北京的几个国家银行⁽²⁾的钞票，信用日见其好了，真所谓蒸蒸日上。听说连一向执迷于现银的乡下人，也知道这既便当，又可靠，很乐意收受，行使了。至于稍明事理的人，则不必是“特殊知识阶级”，也早不将沉重累坠的银元装在怀中，来自讨无谓的苦吃。想来，除了多少对于银子有特别嗜好和爱情的人物之外，所有的怕大都是钞票了罢，而且多是本国的。但可惜后来忽然受了一个不小的打击。

就是袁世凯想做皇帝的那一年，蔡松坡先生溜出北京，到云南去起义⁽³⁾。这边所受的影响之一，是中国和交通银行的停止兑现。虽然停止兑现，政府勒令商民照旧行用的威力却还有的；商民也自有商民的老本领，不说不要，却道找不出零钱。假如拿几十几百的钞票去买东西，我不知道怎样，但倘使只要买一枝笔，一盒烟卷呢，难道就付给一元钞票么？不但不甘心，也没有这许多票。那么，换铜元，少换几个罢，又都说没有铜元。那么，到亲戚朋友那里借现钱去罢，怎么会有？于是降格以求，不讲爱国了，要外国银行的钞票。但外国银行的钞票这时就等于现银，他如果借给你这

钞票，也就借给你真的银元了。

我还记得那时我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很有些恐慌。俄国革命以后的藏着纸卢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这样的罢；至多，不过更深更大罢了。我只得探听，钞票可能折价换到现银呢？说是没有行市。幸而终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几。我非常高兴，赶紧去卖了一半。后来又涨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兴，全去换了现银，沉甸甸地坠在怀中，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两。倘在平时，钱铺子如果少给我一个铜元，我是决不答应的。

但我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甸甸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4〕，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

我们不必恭读《钦定二十四史》〔5〕，或者入研究室，审察精神文明的高超。只要一翻孩子所读的《鉴略》〔6〕，——还嫌烦重，则看《历代纪元编》〔7〕，就知道“三千余年古国古”的中华，历来所闹的就不过是一个小玩艺。但在最近编纂的所谓“历史教科书”一流东西里，却不大看得明白了，只仿佛说：咱们向来就很好的。

但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

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

假使真有谁能够替他们决定，定下什么奴隶规则来，自然就“皇恩浩荡”〔8〕了。可惜的是往往暂时没有谁能定。举其大者，则如五胡十六国〔9〕的时候，黄巢〔10〕的时候，五代〔11〕时候，宋末元末时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纳粮以外，都还要受意外的灾殃。张献忠〔12〕的脾气更古怪了，不服役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将奴隶规则毁得粉碎。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来一个另外的主子，较为顾及他们的奴隶规则的，无论仍旧，或者新颁，总之是有一种规则，使他们可上奴隶的轨道。

“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13〕！”愤言而已，决心实行的不多见。实际上大概是群盗如麻，纷乱至极之后，就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而且这规则是不象现在那样朝三暮四的。于是便“万姓胪欢〔14〕”了；用成语来说，就叫作“天下太平”。

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15〕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16〕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湾子了。有

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17〕}”，那些作乱人物，从后日的“臣民”看来，是给“主子”清道辟路的，所以说，“为圣天子驱除云尔^{〔18〕}。”

现在入了那一时代，我也不了然。但看国学家的崇奉国粹，文学家的赞叹固有文明，道学家的热心复古，可见于现状都已不满了。然而我们究竟正向着那一条路走呢？百姓是一遇到莫名其妙的战争，稍富的迁进租界，妇孺则避入教堂里去了，因为那些地方都比较的“稳”，暂不至于想做奴隶而不得。总而言之，复古的，避难的，无智愚贤不肖，似乎都已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19〕}，就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了。

但我们也就都象古人一样，永久满足于“古已有之”的时代么？都象复古家一样，不满于现在，就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么？

自然，也不满于现在的，但是，无须反顾，因为前面还有道路在。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二

但是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人们多起来了，加之以外国人。我常常想，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20〕}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

国人的肉的！

鹤见祐辅氏〔21〕在《北京的魅力》中，记一个白人将到中国，预定的暂住时候是一年，但五年之后，还在北京，而且不想回去了。有一天，他们两人一同吃晚饭——

“在圆的桃花心木的食桌前坐定，川流不息地献着山海的珍味，谈话就从古董，画，政治这些开头。电灯上罩着支那式的灯罩，淡淡的光洋溢于古物罗列的屋子中。什么无产阶级呀，Proletariat〔22〕呀那些事，就象不过在什么地方刮风。

“我一面陶醉在支那生活的空气中，一面深思着对于外人有着‘魅力’的这东西。元人也曾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满人也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现在西洋人也一样，嘴里虽然说着Democracy〔23〕呀，什么什么呀，而却被魅于支那人费六千年而建筑起来的的生活的美。一经住过北京，就忘不掉那生活的味道。大风时候的万丈的沙尘，每三月一回的督军们的开战游戏，都不能抹去这支那生活的魅力。”

这些话我现在还无力否认他。我们的古圣先贤既给予我们保古守旧的格言，但同时也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献于征服者的大宴。中国人的耐劳，中国人的多子，也就是办酒的材料，到现在还为我们的爱国者所自诩的。西洋人初入中国时，被称为蛮夷，不免个个蹙额，但是，现在则时机已至，到了我们将曾经献于北魏，献于金，献于元，献于清的盛宴〔24〕，来献给他们的的时候了。出则汽车，行则保护；虽遇清道，然而通行自由的；虽或被劫，然而必得赔偿

的，孙美瑶〔25〕掳去他们站在军前，还使官兵不敢开火。何况在华屋中享用盛宴呢？待到享受盛宴的时候，自然也就是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时候；但是我们的有些乐观的爱国者，也许反而欣然色喜，以为他们将要开始被中国同化了罢。古人曾以女人作苟安的城堡，美其名以自欺曰“和亲”，今人还用子女玉帛为作奴的赞敬〔26〕，又美其名曰“同化”。所以倘有外国的谁，到了已有赴宴的资格的现在，而还替我们诅咒中国的现状者，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

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27〕。”（《左传》昭公七年）〔28〕

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

虽然那是古事，昭公七年离现在也太辽远了，但“复古家”尽可不必悲观的。太平的景象还在：常有兵燹，常有水旱，可有谁听到大叫唤么？打的打，革的革，可有处士来横议〔29〕么？对国民如何专横，向外人如何柔媚，不犹是差等的遗风么？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实并未为共和二字所

埋没，只有满人已经退席，和先前稍不同。

因此我们在目前，还可以亲见各式各样的筵宴，有烧烤，有翅席，有便饭，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饭，路傍也有残羹，野上也有饿草；有吃烧烤的身价不资的阔人，也有饿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30]（见《现代评论》二十一期）。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

外国人中，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占了高位，养尊处优，因此受了蛊惑，昧却灵性而赞叹者，也还可恕的。可是还有两种，其一是以中国人为劣种，只配悉照原来模样，因而故意称赞中国的旧物。其一是愿世间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兴趣，到中国看辫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丽看笠子，倘若服饰一样，便索然无味了，因而来反对亚洲的欧化。这些都可憎恶。至于罗素^[31]在西湖见轿夫含笑，便赞美中国人，则也许别有意思罢。但是，轿夫如果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不是现在似的中国了。

这文明，不但使外国人陶醉，也早使中国一切人们无不陶醉而且至于含笑。因为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

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坟》

注 释

〔1〕本篇最初分两次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八日、二十二日《莽原》周刊第三期和第五期。后由作者编入《坟》。

〔2〕国家银行：指当时袁世凯军阀政府开设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

〔3〕袁世凯想做皇帝的那一年，蔡松坡先生溜出北京，到云南去起义。袁世凯（一八五九——一九一六），清朝末年北洋军阀头子。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后，他依靠反革命的武力和帝国主义的支持，利用当时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于一九一二年篡夺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组织了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利益的第一个北洋军阀政府。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又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公然称帝，恢复君主专制政体。这时，立宪派的蔡锷（字松坡）避开袁世凯的监视，逃回云南组织护国军，反对帝制，并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宣布起义，当即得到各省响应。袁世凯被迫于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取消帝制，六月六日死于北京。

〔4〕有如元朝定讞，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多桑《蒙古史》第二卷第二章中曾引窝阔台（元太宗）的话说：“成吉思汗法令，杀一回教徒者罚黄金四十巴里失（货币单位），而杀一汉人者其偿价与一驴相等”。鲁迅是根据这类历史资料讲的，意即当时汉人的地位与奴隶相同，其价格仅与一匹牲口相等。

〔5〕《钦定二十四史》：清朝乾隆年间辑印的自汉朝《史记》到明朝《明史》的二十四部史书，合称《二十四史》，又称《钦定二十四史》。旧时称封建皇帝审定叫“钦定”。

〔6〕《肇略》，清朝王仕云著，是旧时启蒙用的一种四言韵语的简要历史读物。上起盘古，下迄明朝弘光。

〔7〕《历代纪元编》：是清朝李兆洛著的一部（共三卷）翻检中国历代年号的工具书。

〔8〕“皇恩浩荡”：是封建官吏歌颂皇帝的用语。意思是皇帝的恩德广大无边。

〔9〕五胡十六国：时代名。在公元三〇四年至四三九年间，匈奴、羯、鲜卑、氐、羌五个少数民族（旧史书上称汉族以外的民族为“胡”），先后在我国东北、华北、西南和西北，建立政权，连同汉族建立的前凉、西凉、北燕在内，计有：二赵（前、后）、四燕（前、后、南、北）、五凉（前、后、南、北、西）、三秦（前、后、西）、夏、成汉共十六国。故称“五胡十六国”。

〔10〕黄巢：唐末农民起义的领袖。旧时关于黄巢的记载，多被封建文人所歪曲，鲁迅这里所说黄巢起义时人民惨遭灾殃，就是根据这种记载而来的。

〔11〕五代：即公元九〇七年至九六〇年间的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

〔12〕张献忠：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旧史书诬蔑他杀戮残暴，鲁迅受了这种史料的影响，所以在这里说张献忠残杀人民。

〔13〕“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语见《尚书·汤誓》篇。这是传说在夏桀暴政统治下，人民诅咒夏桀的话。意思是说夏桀呀，你何不灭亡，我们愿与你同归于尽。

〔14〕“万姓胪欢”：普天之下的老百姓都表示欢欣。这是对所谓“太平盛世”的讽刺。

〔15〕发祥：语见《诗经·商颂·长发》篇。旧历史书称一个民族形成或帝业建立的最初时期为“发祥”。

〔16〕中兴：旧史书称一个国家或朝代衰而复兴为“中兴”。

〔17〕“一治一乱”：语见《孟子·滕文公》篇。意思是说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是：太平一阵子，又乱一阵子。

〔18〕“为圣天子驱除云尔”：语见《汉书·王莽传赞》（原语为“圣王之驱除云尔”）。意思是说那些发动作乱的人物只不过是替那最后作了皇帝的人清扫道路罢了。

〔19〕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指清朝（从公元一六四四年至一九一一年共二

百六十八年，三百年是个大概数字）以前的封建社会。

〔20〕疾首蹙额：语见《孟子·梁惠王》篇。即愁眉苦脸。

〔21〕鹤见祐辅：日本资产阶级评论家。鲁迅曾选译过他的随笔《思想·山水·人物》。《北京的魅力》一文，即见于此书。

〔22〕Proletariat：英语，无产阶级。

〔23〕Democracy：英语，民主。

〔24〕北魏、金、元、清：北魏（三八六——五三四）、金（一一一五——一二三四）、元（一二七一——一三六八）、清（一六四四——一九一一），都是历史上少数民族统治中国的朝代名称。

〔25〕孙美瑶：当时盘据在山东省抱犊崮的土匪头子。一九二三年五月五日在津浦铁路临城车站劫车，虏去中外旅客多人。这是当时轰动一时的事件。

〔26〕贻敬：古人拜见尊长时所送的礼物。

〔27〕王、公、大夫、士、皂、舆、隶、僚、仆、台：封建社会等级的名称。前四种是属于统治阶级的等级，后六种是被奴役者的等级。

〔28〕《左传》昭公七年：《左传》，《春秋左氏传》的简称，相传为春秋时左丘明根据当时各国史料编成的一部解释和补充《春秋》史实的史书。“昭公七年”，即鲁昭公七年（约当公元前五三五年）。

〔29〕处士横议：语见《孟子·滕文公》篇。“处士”，没有做官的士人，“横议”，无所顾忌地进行非议。

〔30〕每斤八文的孩子：见一九二五年五月二日《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一期仲翔的《一个四川人的通信》：“男孩子只卖八枚铜子一斤，女孩这个价钱也卖不了”。这是当时军阀统治下人民悲惨生活的写照。

〔31〕罗素（一八七二——一九七〇）：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一九二〇年曾来中国讲学，并在中国各地游览。在他著的《中国问题》一书中，记有中国的轿夫休息时“谈着笑着，好象一点忧虑都没有似的”。文中的“轿夫含笑”，即指此。

讲解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中国人民一直处于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

受剥削，精神上受奴役的地位。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由于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使这场革命很快流产，紧接着就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一步勾结起来蹂躏中国人民。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第一次吹响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号角，给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但未能从根本上铲除封建剥削制度，没有彻底斩断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赖以奴役中国人民的精神支柱——孔孟之道。因此，在“五四”运动后，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为了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维护封建文化和人吃人的封建等级制度，又抬出孔孟的亡灵，打出“保存国粹”的破旗，竭力提倡“宗孔读经”、“整理国故”。与此同时，帝国主义为了阻止中国的社会改革，使中国永远成为他们“赏鉴”的“大古董”，也别有用心地赞叹“中国固有文明”，鼓吹“崇奉道学，保存国粹”，中外反动派掀起的这股复古逆流，严重阻碍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

一九二五年，正当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即将爆发的前夜，鲁迅为了配合当时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迎接这次革命高潮的到来，于是写了《灯下漫笔》这篇揭露封建等级制度及其文化的罪恶和批判封建复古主义者的反动谬论的杂文。

鲁迅从旧垒中来，对中国历史又有过深刻的研究，深知旧中国的积弊，同时，他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逐步形成了朴素的唯物论和阶级论的历史观。因此，他在《灯下漫笔》中，针对中外反动派及其走狗文人主张“保存国粹”、“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反动谬论，无情地揭露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的实质，猛烈地抨击了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道德的吃人本质，强烈地控诉了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狼狈为奸残害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彻底揭穿了封建复古主义者的反动面目，并且号召人们起来摧毁旧世界、创造新世界。鲁迅这篇文章的发表，对当时的无产

阶级革命运动，起了有力的配合作用。

《灯下漫笔》全文共分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通过对中国历史的深刻剖析，揭露和批判了中国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阶级本质，用血的事实驳斥了封建复古主义者“保存国粹”的反动谬论。

首先，文章以袁世凯复辟帝制后，广大人民群众纷纷拿着袁世凯军阀政府发行的钞票打上七折八扣去兑换银元，在吃了大亏之后，他们还感到高兴的事实，引出“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这一论点来。从而为下文揭示旧中国人民所处的奴隶地位，抨击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道德，控诉封建统治阶级残害劳动人民的滔天罪行以及批判封建复古派的无耻谰言，打下了基础。

接着，从正面对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历史进行了剖析。文章深刻地指出：中国历代的封建统治阶级都是“将人不当人”看待；中国劳动人民“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在封建社会里的所谓“太平盛世”，劳动人民不过是暂时可以做奴隶，至于“乱世”，则劳动人民连奴隶也做不成；中国历史上的所谓“一治一乱”的把戏，对于劳动人民来说，只不过是“想做奴隶而不可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这两个时代的反复更替而已，根本谈不上什么真正的“治”和“乱”。通过这些剖析，既深刻地揭露了中国几千年来改朝换代的阶级本质和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残害人民的罪恶，又有力地揭穿了封建复古主义者妄图维护人吃人的封建等级制度，使劳动人民永远做奴隶的反动本质。

随后，从侧面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现状。文章先以国学家、文学家和道学家都不满足于现状，一心想开历史倒车的事实，来说明当时中国实际是处于“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再用“百姓”一遇军阀混战，就“迁进租界”、“避入教堂”，躲到那些比较“稳”的地方去，乞求洋人的庇护等现象，来证明当时的中国又处于“暂时做